

# 修改说明

(稿件编号: psysci21-072; 修改日期: 2021-09-16)

非常感谢《心理科学》编辑以及评阅专家! 您的审稿意见使我们受益非浅。根据有关意见和建议, 逐一回答, 并说明修改之处。

1、对英文摘要的要求: 为扩大本刊国际学术影响力, 本刊要求每篇论文或研究报告均需撰写长英文摘要(500个单词以上, 约一个 page)。研究报告与论文所附英文摘要应包括研究目的、方法、结果、结论等。

回答: 根据贵刊要求, 本研究撰写了长英文摘要, 单词为 505 个。英文摘要包括了研究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

2. 请根据《心理科学》投稿指南的要求, 修改文稿格式, 自 2020 年起, 请使用 APA 第 7 版格式。

回答: 本研究已经根据《心理科学》投稿指南的要求和 APA 第 7 版格式要求对文稿格式进行了修改。请见文中绿色字体部分。

3. 对文章中图和表的要求: 由于来稿中的图片质量参差不齐, 多数图片质量不符合发排的要求。为了提高作图质量, 请作者务必检查自己文稿中的图片或照片是否清晰! 以下是对文稿中各图的具体要求: 1) . 请将图片或照片插入到正文中, 不必单独提供图片文件。2) . 请提供照片或图片的原件, 如无原件请自行制作一张清晰的图片。所提供的照片或图片应层次分明, 黑白图片或彩色图片均可。由于排版需要, 请不要以插入图片的形式插入表格, 请用 word 制作表格, 并将表格插入到正文中, 不需提供单独的表格文件。(word 制作表格时, 按从左到右, 从上到下的顺序, 一行一行输入数据。)

回答: 根据贵刊建议, 本研究检查了文稿中的图, 保证了图的清晰度, 并将图插入到正文中。此外, 本文稿中的表格是使用 word 制作, 并插入到正文中。

4、关于作者、基金项目的说明。请按照模板要求的格式, 在文中提供准确的中英文作者、单位和基金信息。作者及单位信息以投稿时为准, 不可擅自更改作者、作者顺序及单位信息。

回答: 本研究已按照模板要求的格式, 在文中提供了准确的中英文作者、单位和基金信息。且和投稿时作者及单位信息一致。请见第 8 页和第 22 页绿色字体部分。

5、关于文后参考文献: 文后参考文献先“中文”, 后“英文”, 按照首字母排序, 无需数字排序。

回答: 文后的参考文献按照贵刊要求对文献使用了先“中文”, 后“英文”, 按照字母进行了排序。

6、关于文中出现的数字。注意: 删除自检报告, 增加作者和基金信息(注: 作者及单位信息以投稿时为准, 不可更改), 检查文稿写作规范是否完全符合 APA 第 7 版要求。长度尽量在 9000 字内(含中英文摘要及参考文献), 请根据您的实际情况进行适当增删。

回答: 根据贵刊建议, 对全文字数进行了删减, 控制了 9000 字内, 具体为 8997 (含中英文摘要及参考文献)。

# 修改说明

(稿件编号: psysci21-072; 修改日期: 2021-3-30)

非常感谢《心理科学》编辑以及评阅专家! 您的审稿意见使我们受益非浅。根据有关意见和建议, 逐一回答, 并说明修改之处。

以下回答专家 1 的意见:

1. 对于幼儿的消极情绪, 本文仅关注恐惧与受限后沮丧。为何仅关注这两种情绪, 其它在气质问卷的消极情绪维度为何不关注。本文并未给出合理解释。

回答: 非常感谢专家的宝贵意见。

从 Gray 的趋近-回避的角度对情绪性进行划分, 婴儿刚出生时只具有趋近和回避两种情绪倾向。儿童的受限后沮丧是逐渐从趋近倾向中分化出来的, 它体现了行为激活系统(Behavioral Activation System)的作用; 恐惧是逐渐从回避情绪倾向中分化出来的, 它体现了行为抑制系统(Behavioral Inhibition System)的作用(Carver & Harmon-Jones, 2009; Fox, 1991; Lewis, 2010)。从理论上讲, 受限后沮丧和恐惧虽然同属于消极情绪, 但隶属系统不同, 并产生不同的行为结果。如恐惧与内化问题行为显著相关, 受限后沮丧与外化问题行为显著相关(Moran, et al., 2013)。内化和外化问题行为也分别体现了行为抑制系统和行为激活系统的作用。本研究以此为出发点探讨隶属不同行为系统的消极情绪对隶属不同行为系统问题行为的作用机制。气质问卷中的其他消极情绪维度没有像受限后沮丧和恐惧一样完全体现出行为激活或行为抑制系统的特点(Planalp, Carol, Gagne, & Hill, 2017), 所以本研究只关注了受限后沮丧和恐惧两个维度。

本研究在 P1 引言部分第 2 段进行了补充说明, 请见该段蓝色字体部分“**恐惧和受限后沮丧虽同属于消极情绪, 但分别体现了行为抑制系统和行为激活系统的作用(Fox, 1991; Lewis, 2010), 并导致不同的行为结果(Moran, Lengua, & Zalewski, 2013; 刘亚鹏, 邓慧华, 梁宗保, 张光珍, 陆祖宏, 2019)。**”

2. 关于中介变量, 作者选取严厉管教。然而, 对于 2 岁儿童的父母而言, 其对 2 岁儿童的管教更多是以温暖回应等积极的教养方式为主, 尤其是儿童在恐惧、沮丧等情绪时, 父母更是多以积极回应和安慰为主。对于这一变量在 2 岁儿童父母教养中的适用性以及为何选取这一变量应予以更合理的解释。

回答: 严厉管教是指父母对儿童采取的强硬行为和消极情绪表达, 包括呵斥、打屁股等(Chang, Schwartz, Dodge, & Mcbridechang, 2003)。Straus 和 Stewart (1999) 发现, 35%的婴儿和 94%的学步儿受到过体罚, 而且比例在 2 岁时达到高峰。Kim 等人(2010)也发现, 父母严厉管教行为在 0-3 岁间逐渐上升, 尤其在 1-2 岁间上升显著。Brooker 和 Buss 还通过研究证实, 在儿童 2 岁时父母的严厉管教和恐惧会交互影响儿童 4 岁时的恐惧和错误监控行为(Brooker & Buss, 2014)。其他也有不少研究关注儿童 2 岁时父母的严厉管教(Callahan, Scaramella, Laird, & Sohr-Preston, 2011)。所以, 本研究选取了父母严厉管教这一因素进行研究。参考文献如下:

Brooker, R. J., & Buss, K. A. (2014). Harsh parenting and fearfulness in toddlerhood interact to predict amplitudes of preschool error-related negativity. *Developmental Cognitive Neuroscience*, 9, 148-159.

Callahan, K. L., Scaramella, L. V., Laird, R. D., & Sohr-Preston, S. L.. (2011). Neighborhood

disadvantage as a moderator of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harsh parenting and toddler-aged children's internalizing and externalizing problems.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Jfp Journal of the Division of Family Psychology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5(1), 68.

- Kim, H. K., Pears, K. C., Fisher, P. A., Connelly, C. D., & Landsverk, J. A. (2010). Trajectories of maternal harsh parenting in the first 3 years of life. *Child Abuse & Neglect*, 34(12), 897-906.
- Straus, M. A., & Stewart, J. H. (1999). Corporal punishment by American parents: National data on prevalence, chronicity, severity, and duration, in relation to child, and family characteristics. *Clinical Child and Family Psychology Review*, 2, 55-70.

本研究在 P2 第 3 段 5-6 行补充了为什么在儿童 2 岁时测量严厉管教，具体请见蓝色字体部分“父母严厉管教在儿童 2 岁时达到高峰，且对儿童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Brooker & Buss, 2014; Straus, & Stewart, 1999)，因此本研究在儿童 24 个月时测量父母的严厉管教。”

3. 在研究方法上，气质问卷过于陈旧，目前使用的是 1981 年 Rothbart 编制的气质问卷，近些年，该问卷一直被开发者修订，有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详细程度的多个版本。作者未能选用最新版本进行研究，非常遗憾。另外结果中的恐惧与沮丧两个维度的相关不显著，这提示研究者需要关注研究工具的信效度是否可以达到心理测量学标准。

回答：非常感谢专家的宝贵意见。

由于没有找到最新修订问卷，本研究确实很遗憾没有使用最新版 IBQ。本研究没使用原 IBQ 的全部题目，而是请国际著名儿童发展心理学专家从中抽取了部分关于受限后沮丧和恐惧的题目、经翻译和回译后组成了一个新问卷。本研究采用 Lisrel 8.70 统计软件，以极大似然估计法对形成的新问卷进行了验证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该问卷的拟合指数分别为 $\chi^2=294.08$ ,  $df=146$ ,  $\chi^2/df=2.01$ , CFI=0.91, IFI=0.91, GFI=0.91, RMSEA=0.055。这说明，问卷的结构效度良好，可以用于本研究。本研究在 P3 研究工具中第 1 段对该问题进行了重新表述和补充，请见蓝色字体部分“婴儿行为问卷(Infant Behavior Questionnaire, IBQ)被广泛运用于测量儿童的气质(Rothbart, 1981)，且在中国人群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Gartstein & Rothbart, 2003;于珩, 张明浩, 陈欣银, 邓慧华, 陆祖宏, 2011)。本研究从该问卷中抽取部分条目测量恐惧情绪(8 个条目；例如“当见到陌生人的时候，远离陌生人”)和受限后沮丧(11 个条目，例如“在等着吃东西或喝东西的时候，大声哭闹。”)，并采用“从不或很少(1 分)”到“几乎总是(5 分)”五级计分。采用 Lisrel 8.70 统计软件，以极大似然估计法对形成的新问卷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该问卷的拟合指数分别为 $\chi^2=294.08$ ,  $df=146$ ,  $\chi^2/df=2.01$ , CFI=0.91, IFI=0.91, GFI=0.91, RMSEA=0.055。两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72 和 0.64。”

Rothbart 课题组发现，受限后沮丧和恐惧在 6 个月时显著正相关，但在 10 和 13 个月时相关不显著(Rothbart, Derryberry, & Posner, 1994)。所以推测，儿童消极情绪的表现形式在 6 个月时尚未完全分化，但在 14 个月时两者可能已经比较分化，所以在 14 个月时两个维度相关程度较低。本研究中，开始没有控制儿童性别和年龄时，恐惧和受限后沮丧两个维度在 14 个月时皮尔逊积差相关分析结果不显著。但是，控制儿童性别和年龄之后的偏相关结果显示，恐惧和受限后沮丧显著正相关( $r=0.14, p<0.05$ )。为此，本研究重新采用偏相关分析对数据进行了分析。具体结果请见 P4 第 3 段 4-7 行蓝色字体部分“控制幼儿性别和年龄后，表 1 的皮尔逊积差相关矩阵显示，父亲的受教育年限与儿童外化问题行为显著负相关，母亲受教育年限与父亲严厉管教显著正相关，受限后沮丧与恐惧、外化问题行为、母亲严厉管教

显著正相关；恐惧与内化问题行为显著正相关；父母严厉管教与内化和外化问题行为显著正相关；母亲严厉与父亲严厉管教显著正相关。”和表 1。

4. 研究过程介绍不明确，有些内容需要补充。作者自述为随机取样，那么被试的电子邮件和电话是从哪里获知的等信息尚未提及。

回答：本研究被试的电子邮件和电话均是从妇幼保健医院获得。根据专家的建议，本研究补充了被试来源，具体请见第 3-4 页 2.3 研究过程中的第一句话中蓝色字体部分：“在幼儿 14 个月时，本研究通过南京某妇幼保健医院，采用电子邮件和电话的方式随机邀请幼儿参与研究。”

5. 内化问题行为主要包括情绪问题，其中涉及到的各种消极情绪与气质中的消极情绪如何区分，以及变量的多重共线性问题需要进一步解释与区分。

回答：非常感谢专家的宝贵意见。本研究中内化问题行为包括的情绪问题主要是抑郁/焦虑，气质的消极情绪为受限后沮丧（生气）和恐惧。受限后沮丧、恐惧与抑郁/焦虑是不同的消极情绪体验，可以清晰区分。

本研究根据专家建议，检测了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结果显示：容忍度均大于 0.2，方差膨胀因子 VIF 均小于 1.2。说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本研究在 P4 第 2 段第 8-9 行对此内容进行了补充，请见蓝色字体部分“然后，在删除少数极端值后，本研究还检测了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结果显示：容忍度均大于 0.2，方差膨胀因子 VIF 均小于 1.2。说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

6. 在结果分析部分，作者完全根据相关分析结果中各变量之间的相关与否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忽视了变量之间关系的理论基础。比如，为何将恐惧与沮丧分别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其有必要进一步说明。

回答：非常感谢专家的宝贵意见。本研究根据专家意见，将恐惧和受限后沮丧同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由于内化和外化问题行为存在中等程度的相关，所以也同时将两者纳入到模型中，并采用 Mplus 软件对该模型进行了验证。结果显示，模型拟合指标良好， $\chi^2=6.98$ ,  $df=7$ , RMSEA=0.00, CFI=1.00, TLI=1.00, SRMR=0.02。具体结果请见 P4 第 1-3 段散落的蓝色字体部分和图 1。

由于父母严厉管教对问题行为的影响与之前模型有些出入，本研究在 P6 第 5 段进行了修改，请见蓝色字体部分“然而，母亲严厉管教和父亲严厉管教对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究其原因可能是，在中国文化中，“慈母严父”形象在大多数家庭中普遍存现，这种形象也反映了父子关系和母子关系存在差异，如父子互动失调通常高于母子互动失调(刘莉, 王美芳, 2018)。即使母亲严厉管教儿童，以往的“慈母”形象可能会使儿童敢于违抗、甚至出现攻击行为，但焦虑、抑郁情绪较低；而父亲的以往的“严父”形象使儿童面对父亲严厉管教时不敢违抗、产生强烈的挫败感，进而导致焦虑/抑郁情绪较高。”

7. 在研究设计上，有必要在第一阶段收集幼儿的问题行为，并将其作为控制变量纳入结构方程模型。

回答：非常感谢专家的宝贵意见。在儿童 18 个月之前，问题行为还没有明确的行为特征，也没有有效的、成熟的测量工具测量 18 个月之前的问题行为。而 48 个月时儿童问题行为比较稳定，且易测查（张光珍 等, 2008）。所以本研究没有在 14 个月测量儿童的问题行为，

并对其进行控制。这也是本研究的一个不足。根据专家建议，本研究在讨论中 P7 第 1 段和第 3 段对此进行了谨慎推论和解释，请见蓝色字体部分：“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儿童的发展结果既不是儿童自身气质特征单独作用的结果，也不是家庭环境单独作用的结果，而是儿童与家庭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和“首先，由于儿童在 14 个月时的问题行为表现不清晰、难以测量，本研究没能在 14 个月时也测量问题行为，并对此进行控制，导致没能很好地验证三个变量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关系。所以在结果的解释上还需谨慎。将来研究还需致力于开发出能够准确测量儿童 2 岁前问题行为的工具”。

#### 以下回答专家 2 的意见：

1. 在研究过程中，作者陈述“母亲评价幼儿的消极情绪和人口统计学信息。然后，在儿童 2 岁时，邀请父母分别填写父母严厉管教问卷。两年后，再次邀请父母分别评价儿童的问题行为”。其实本研究既包含父亲，又包含母亲，这样两部分数据非常难得，父母间是否存在差异，在文中没有清楚体现，只是在描述统计部分有分别的得分，但是在模型中却直接使用严厉管教，那么父母的分数如何处理没有交代。

回答：非常感谢专家的宝贵建议。本研究在描述统计部分补充了父母严厉管教是否存在差异的结果。具体请见 P4 第 3 段 8-9 行蓝色字体部分“但配对样本  $t$  检验显示，母亲和父亲严厉管教没有显著差异 ( $M_1=2.40, SD_1=0.46, M_2=2.44, SD_2=0.49, t=-1.22, df=290, p>0.05$ )。”

在模型中，本研究分别使用了中心化处理后的父亲和母亲严厉管教作为中介变量。本研究在 P5 第 1 段 3 行进行了补充，请见蓝色字体部分“所有预测变量和中介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后”。

2. 需要作者进一步陈述逻辑，14 个月由母亲评价了儿童的消极情绪，然后大约八个月后测查了父母的严厉管教，感觉逻辑有点问题，孩子的情绪行为可能是由于父母的管教方式引发的，所以这样的时间点安排，可能需要更有说服力的解释。

回答：非常感谢专家的宝贵意见。受限后沮丧和恐惧在 12 个月时开始出现分化，但区别不十分明显，到 14 个月时已经分化(Braungart-Rieker, Hill-Soderlund, & Karrass, 2010)。所以本研究在 14 个月时测量了受限后沮丧和恐惧。父母严厉管教在儿童 2 岁时达到高峰，且对儿童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Brooker & Buss, 2014; Straus, & Stewart, 1999)，受限后沮丧和父母严厉管教的测量时间有先后，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反应儿童消极情绪对父母行为的影响。所以本研究在 2 岁时测量了父母严厉管教。

3. 追踪研究的流失率需要在被试部分进行报告。

回答：由于本研究的时间跨度较长，从 14 个月到 48 个月将近 3 年，被试流失了 72 名，被试流失率为 20%，但经过统计建议，被试流失没有造成研究结果偏差。本研究根据专家建议在被试部分补充了被试流失率。具体请见 P2 最后 1 段第一行蓝色字体部分“从儿童 14 个月到 4 岁，72 个家庭因搬家等原因决定退出研究，被试流失率为 20%。”

#### 以下回答专家 3 的意见：

1. 作者在引言第三段的最后一句中引用以往研究来进一步论述父母的严厉管教会导致儿童的内化问题行为这个观点，但作者所列举的研究中所提及的被试为青少年，期望作者可以重新提供新的研究作为佐证。

回答：非常感谢专家的宝贵意见。根据专家的宝贵意见，本研究对此进行了更新，具体请见 P1 第 3 段第 6-7 行蓝色字体部分：“由此也会导致儿童的内化问题行为(Mckinney & Szkody, 2019; Lunkenheimer, Ram, Skowron, & Yin, 2017)。例如，Lunkenheimer 等人发现，父亲严厉管教正向预测 3.5 岁儿童的内化问题行为(Lunkenheimer, et al., 2017)。”

引用的文献也在参考文献部分进行了更新，请见蓝色字体部分：“Lunkenheimer, E., Ram, N., Skowron, E. A., & Yin, P. (2017). Harsh parenting, child behavior problems, and the dynamic coupling of parents' and children's positive behaviors.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31(6), 689-698. ”

## 2.为什么选择在四岁时测量儿童的问题行为，请作出进一步的说明。

回答：本研究选择在四岁时测量儿童的问题行为主要由以下两个原因：第一，48 个月时儿童的问题行为较为稳定，且易测查（张光珍 等, 2008），且代表了儿童学前期的问题行为。第二，父母严厉管教在儿童 2 岁时达到高峰，且对儿童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Brooker & Buss, 2014; Straus, & Stewart, 1999)，所以本研究在 24 个月时考察了父母严厉管教。但是父母严厉管教和儿童问题行为可能存在相互作用，如果在 24 个月时同时考察父母严厉管教和儿童问题行为，无法确认是父母养育方式引起儿童问题行为，还是儿童问题行为影响了父母养育方式。在 24 个月时测查严厉管教，48 个月时测查问题行为能说明严厉管教对儿童问题行为为单向影响。综上，本研究在 48 个月测量学前儿童的问题行为。

本研究在 P2 第 3 段第 7-9 行对此进行了补充说明。具体请见蓝色字体部分“此外，由于 48 个月时的问题行为比较稳定、有成熟工具可有效测查（张光珍，梁宗保，陈会昌，张萍，2008），且能够代表学前期的问题行为，所以本研究在 48 个月时测量儿童问题行为。”

本研究也在参考文献部分进行了补充：“张光珍，梁宗保，陈会昌，张萍. (2008). 2~11 岁儿童问题行为的稳定性与变化. *心理发展与教育*, (02), 3-7.”

## 3.在研究工具部分，测量消极情绪的问卷中受限后沮丧这个维度的信度比较低。这会使得我对结果的可靠性存在一定的疑虑。

回答：非常感谢专家的宝贵意见。情绪性的两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确实不高，但与以往研究一致(朱颖，刘亚鹏，张光珍，等，2014; Gartstein, Gonzalez, Carranza, Ahadi, & Rothbart, et al., 2006; Rothbart, 1981)。例如，Gartstein 等人报告，IBQ 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处于 0.60 至 0.91 之间。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婴幼儿年龄较小，无法用语言清晰的表达自己的情绪状态。所以评价者可能不太容易准确识别受限后沮丧，进而导致其的内部一致性系数较低。虽然该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较低，但 IBQ 仍然国内外是测量婴幼儿受限后沮丧和恐惧的最广泛的工具。

## 4.在数据处理部分，作者只阐述了此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不严重，但未提供相应的数据支持。希望作者加以补充。

回答：非常感谢专家的宝贵建议。之前由于篇幅限制，省略了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结果。现在根据评审专家的建议，对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结果进行了补充说明，具体请见 P4 中第 2 段第 4-7 行蓝色字体部分“其次，本研究运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分析共同方法偏差(Podsakoff, Mackenzie, Podsakoff, & Lee, 2003)。对儿童消极情绪、母亲严厉管教和母亲报告的问题行为的检验结果显示，特征根值大于 1 的因子有 30 个，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是 9.81%，小于 40%；对儿童消极情绪、父亲严厉管教和父亲报告的问题行为的检验结果显示，

特征根值大于 1 的因子有 29 个，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是 10.51%，小于 40%。这说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5.在描述性统计分析部分，作者未能提供控制变量（儿童性别、年龄等）的描述性信息，希望作者加以补充。

回答：非常感谢专家的宝贵建议。根据专家建议，本研究补充了性别和受教育程度的描述性信息，因为年龄与儿童问题行为的相关性不显著（ $r_s=-0.03$  和  $-0.02$ ， $p_s>0.05$ ），本研究没有在结果中呈现。具体请见 P4 第 3 段中的第一段蓝色字体部分“本研究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考察了儿童消极情绪、问题行为是否存在性别差异，结果显示，男孩受限后沮丧显著高于女孩( $M_1=2.74$ ,  $SD_1=0.44$ ,  $M_2=2.58$ ,  $SD_2=0.47$ ,  $t=2.99$ ,  $df=284$ ,  $p<0.01$ )，男孩的内化问题行为显著低于女孩( $M_1=0.19$ ,  $SD_1=0.11$ ,  $M_2=0.32$ ,  $SD_2=0.18$ ,  $t=-6.34$ ,  $df=283$ ,  $p<0.01$ )。控制幼儿性别和年龄后，表 1 的皮尔逊积差相关矩阵显示，父亲的受教育年限与儿童外化问题行为显著负相关，母亲受教育年限与父亲严厉管教显著正相关”。

6.作者在讨论部分逻辑比较清晰且比较详细，但作者在描述恐惧对内化问题行为的其他作用途径时有些不清，尤其是作者提到消极养育行为和儿童抑制控制的调节作用，这并不属于作用机制。希望作者仔细考虑这个问题。

回答：非常感谢专家的宝贵建议。本研究对此进行了修改。请见P7第2段蓝色字体部分“最后，在本研究中，恐惧对内化问题行为的直接作用显著。这可能是因为恐惧和内化问题行为同属于行为抑制系统(Fox, 1991)，有共同的神经基础所致。额叶delta-beta耦合反映了额叶与杏仁核、海马等边缘系统的连接功能，是参与情绪调节过程的重要神经机制(Phelps, Brooker, & Buss, 2016)。以往脑电时频分析研究结果发现，恐惧情绪较高的幼儿呈现出额叶delta-beta耦合程度增强的特征(Phelps, et al, 2016)，额叶delta-beta耦合程度较高的幼儿具有较高的焦虑、社交退缩行为(Pascalis, Vecchio, & Cirillo, 2020; Poppelaars, Anita, Michiel, & Van, 2018)。所以，额叶delta-beta耦合异常可能是恐惧直接导致儿童内化问题行为的神经机制之一。此外，还有研究发现，右侧额叶不对称性越高，恐惧对内化问题行为的影响越大(Liu, Calkins, & Bell, 2020)。这也可能是恐惧直接导致内化问题行为的原因之一。然后，本研究还发现父母严厉在恐惧与内化问题行为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这说明，恐惧对内化问题行为的作用途径与受限后沮丧不同。这可能是由儿童恐惧和受限后沮丧导致的后果不同，所以父母对这两种情绪采用的应对行为也不同所致。”

本研究也在参考文献部分进行了文献修改，补充文献请见蓝色参考文献：

- Pascalis, V. D., Vecchio, A., & Cirillo, G. (2020). Resting anxiety increases EEG delta-beta correlation: relationships with the reinforcement sensitivity theory personality trait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56, 1-6.
- Phelps, R. A., Brooker, R. J., & Buss, K. A. (2016). Toddlers' dysregulated fear predicts delta-beta coupling during preschool. *Developmental Cognitive Neuroscience*, 17, 28-34.
- Poppelaars, E. S., Anita, H., Michiel, W. P., & Van, D. (2018). Frontal delta-beta cross-frequency coupling in high and low social anxiety: an index of stress regulation? *Cognitive Affective & Behavioral Neuroscience*, 18(4), 1-14.

7. 既然作者用 Mplus 进行分析，并且内化问题和外化问题具有中度的相关，作者为什么不把这两个结果变量放到同一个模型进行检验？

回答:非常感谢专家的宝贵意见。本研究根据专家意见，将内化和外化问题行为同时构

建结构方程模型，也同时将恐惧和受限后沮丧两者纳入到模型中，并采用 Mplus 软件对该模型进行了验证。结果显示，模型拟合指标良好， $\chi^2=6.98$ ,  $df=7$ , RMSEA=0.00, CFI=1.00, TLI=1.00, SRMR=0.02。具体结果请见 P4 第 1-3 段散落的蓝色字体部分和图 1。

由于父母严厉管教对问题行为的影响与之前模型有些出入，本研究在P6第5段进行了修改，请见蓝色字体部分“然而，母亲严厉管教和父亲严厉管教对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究其原因可能是，在中国文化中，“慈母严父”形象在大多数家庭中普遍存现，这种形象也反映了父子关系和母子关系存在差异，如父子互动失调通常高于母子互动失调(刘莉, 王美芳, 2018)。即使母亲严厉管教儿童，以往的“慈母”形象可能会使儿童敢于违抗、甚至出现攻击行为，但焦虑、抑郁情绪较低；而父亲的以往的“严父”形象使儿童面对父亲严厉管教时不敢违抗、产生强烈的挫败感，进而导致焦虑/抑郁情绪较高。”

8.本研究意图在于探索三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但由于作者只是在三个时间点分别收集了这三个变量，当变量之间进行跨时间点的预测时并没有考虑因变量的初始水平，所以我认为此结果并没有很好地验证三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作者有没有做一些 alternative model 的检测和对此？同时，作者要在讨论中对这一结果进行谨慎的讨论。

回答：非常感谢专家的宝贵意见。本研究在变量之间进行跨时间点的预测时没有考虑因变量的初始水平，确实没有很好地验证三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本研究没有在 14 个月时测量问题行为，主要是因为儿童 18 个月之前，问题行为还没有明确的行为特征，也没有成熟、有效的测量工具测量 18 个月之前的问题行为。18 个月之后，儿童问题行为开始有明确的特征，到了 48 个月时儿童问题行为就比较稳定，且容易测查（张光珍 等, 2008），所以本研究只在 48 个月测量了儿童问题行为。

前人有研究也采用了在三个时间点分别收集了三个变量的处理方法。例如在 Harold 和 Shelton 的追踪研究中，主要考察了儿童的情绪安全感在父母婚姻冲突与问题行为之间的关系，在每一个时间点上也仅测查了一个变量(Harold, G. T., & Shelton, K. H., (2004). Marital conflict, child emotional security about family relationships and child adjustment. Social Development, 13(3), 350-376)。当然我们也并不认为前人这样做就完全合理，但也并不意味着研究完全没有意义，这样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说明问题。

本研究考察父母严厉管教在消极情绪和问题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变量之间路径系数的显著性也能说明本研究的主题，只是在结果的推论上要更加谨慎，对此本研究在讨论部分进行了修改。如 P7 最后 1 段蓝色字体部分“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儿童的发展结果既不是儿童自身气质特征单独作用的结果，也不是家庭环境单独作用的结果，而是儿童与家庭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和 P7 第三段研究不足中蓝色字体部分“首先，由于儿童在 14 个月时的问题行为表现不清晰、难以测量，本研究没能在 14 个月时也测量问题行为，也没对此进行控制，导致没能很好地验证三个变量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关系。所以在结果的解释上还需谨慎。将来研究还需致力于开发出成熟的、能够有效测量儿童 2 岁前问题行为的工具”。

9.请作者在研究展望部分简述一下本研究结果对实践应用的启示。

回答：根据专家的宝贵建议，本研究在研究展望部分补充了对实践应用的启示。具体请见 P7 第三段 1-4 行蓝色字体部分“本研究结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应用意义，提示父母面对儿童消极情绪时应采取合理的处理方法，避免采用打骂等严厉的养育行为而导致儿童问题行为的发生、加剧这样一个恶性循环过程，也揭示了对无法采用正确方法处理儿童消极情绪的母亲给予家庭教育指导的重要性。”